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转危为机的实践智慧

宋伶俐, 刘朝晖

(南京工程学院 商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67; 南京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67)

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转危为机的历史实践,蕴含着超越特定时空的普遍方法论价值。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锚定革命的历史方位,运用辩证思维解构现实困境,依托群众路线凝聚革命主体,于逆势中扭转态势,在危局中开创新局。这种在危机挑战中锻造出的实践智慧,是以创新智慧实现能力再造,化被动为主动;以团结智慧完成力量整合,聚人心为合力;以发展智慧破解物质匮乏,促变革为动力;以求是智慧统领思想认识,转分歧为共识;以决策智慧驾驭战略方向,于变局中布局。这些层面的智慧本质上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认识论,整合历史洞察与行动方略等实践经验的系统集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实践层面的创造性展开,贯通革命理想与现实行动,融织战略谋划与策略执行。这既为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提供了核心线索,也为新时代破解复杂矛盾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关键词:实践智慧;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转危为机

中图分类号:D231;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25)06-0025-07

抗日战争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存亡之战,更是民族精神涅槃重生的淬火熔炉。在此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侵华日军军事绞杀形成的生存危机、国民党政治孤立导致的战略挤压、根据地经济封锁引发的资源枯竭等多重困局。值此存亡续绝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超凡的战略智慧和强大的实践能力破局求存,在多重挑战交织中开辟出革命新路径。在政治层面,中国共产党精准把握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节点,将外部压力转化为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契机,实现从对抗到联合的阶级跨越;军事层面,突破武器装备的劣势,在游击战实践中积小胜为大胜,完成从军事防御到战略制权的质变飞跃;经济层面,通过减租减息与大生产运动,优化了根据地经济结构,边区军民通过开展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基本实现了

生活物资的自给自足;党的建设层面,以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肃清党内教条主义倾向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团结和统一。在转危为机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锚定革命的历史方位,运用辩证思维解构现实困境,依托群众路线凝聚革命主体,最终形成植根中国语境的革命范式。这种在逆境中转化矛盾双方力量的实践智慧,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运用的典范,始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深化与理论跃升。

一 创新智慧:化危局为新局的开拓之道

通过辩证转化矛盾主次方面所形成的创新智慧,为在逆境中开拓革命新局面提供了根本方法。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危与机作为矛盾的对

收稿日期:2025-10-11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的主题演进研究”(24DJD002);南京工程学院教改项目“人工智能在国家安全教育中的应用场景研究”(JXGG2025ZX13)

作者简介:宋伶俐(1982—),江苏启东人,南京工程学院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通信作者:刘朝晖(1972—),安徽巢湖人,南京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

引用格式:宋伶俐,刘朝晖.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转危为机的实践智慧[J].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7(6): 25-31.

立统一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这一辩证规律,将看似绝对的军事劣势转化为游击战争创新的实践空间,把经济封锁的压力催化为制度创新的内生动力,将外部环境的挑战倒逼为自我革新的契机。通过突破成规、探索新路径,将潜在可能转化为现实解决方案,从而深刻印证了矛盾双方在动态斗争中的统一性。这种化危为机的智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不是简单地否定旧有困境,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对困境的超越。从军事战术的革新到医疗卫生、文化传播等多领域的创造性突破,党的实践始终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拓出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种创新并非脱离实际的空想,而是对战场态势的精准研判、对民众需求的深刻洞察、对外部环境主动适应和选择的结果,为后续各领域的突破性实践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面对日军“囚笼政策”的立体封锁,八路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1],在广大地域袭击敌人翼侧和后方,通过军民协同作战体系,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多样化的游击战,使得日伪防不胜防。“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1]408}。一些精妙的战术原则,被八路军发挥得淋漓尽致。按照刘少奇“既能防御又能进攻”的战术设想,冀中抗日根据地军民通过开展地道战,将常规的地面游击战转入地下,创造性地拓展了游击战的战术空间,“挖掘出总长超1.2万公里的地下网络”^[2],如同重新创造了一层地下的抗日根据地,迫使日军陷入“地下冀中”的泥潭,敌我攻守之势发生巨大变化。

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创新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将极端匮乏转化为系统化解决方案的卓越能力。陕甘宁边区在1937年成立时,总人口约150万人,经济文化落后,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疫病频发。“每年死亡成人与婴儿达八九万人,占总人口的60%”“延安市每年传染病致死人数有500多人,占当地年死亡人口的47%”^[3]。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做好医疗卫生工作对于解决民生疾苦、引导人

民支持革命的重要作用,1942年4月,成立中央防疫总委员会,发布《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组织条例》,建立起覆盖村、乡、县三级疫情监测网络及卫生防疫体系^[4]。更富创新性的是,边区卫生处提出了“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工作方针,将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相结合,成立“边区中西医药研究总会”,并在各地成立相应的分会或支会^[5]。针对时疫、瘟疫、痢疾和扫荡中可能发生的疾病,鼓励中医用边区的土产中药材研制新型药品,发动边区群众采集黄芩、柴胡等野生药材,自制麻黄素、柴胡注射液等急需药品。同时,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创新“流动医疗队”模式,在1938年广灵伏击战中,战地医生在距火线3公里处进行手术72例,控制感染率达到72%,极大提升了战伤救治工作的成效。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对边区卫生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创造了“群众卫生运动”“合作医疗”等新型医疗组织形态,为新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体系提供了原型经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极端条件下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制度创新能力。

文化传播领域的突破性实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斗争规律的深刻把握。针对国民党宣传机器的信息封锁,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构建了“民间外交”传播网络。1944年,中国共产党通过秘密渠道将《晋察冀画报》运抵重庆,用真实的图片报道打破了国民党对敌后战场的污名化宣传。这些画报后来被转送至美国,成为《生活》(LIFE)杂志的重要图片来源。更富创意的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木刻版画,这些作品因其易于复制传播的特性,成为跨越封锁线的“文化轻骑兵”。古元创作的《减租会》和《逃亡地主又归来》等作品,用直观、形象的解读宣讲党的抗战政策。这种传播方式的创新,不仅实践了列宁关于“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论断^[6],而且开创了“视觉”政治传播的先河。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始终坚守革命立场,自觉将艺术创作与时代使命紧密相连,把艺术看作“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把木刻“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7],在硝烟弥漫的岁月里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文化防线。

二 团结智慧:化对立为合力的政治整合

通过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所形成的团结智慧,为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提供战略基石。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在特定历史阶段,正确处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往往决定着革命事业的成败。团结智慧强调的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于适当的人、出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8],在精准把握某一时期特定场合主次矛盾的前提下,将多元主体的差异性诉求转化为统一战线的政治合力,最终形成基于共同目标的最大化动员效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既看到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事实,又不忽视阶级矛盾的客观存在,通过“三三制”政权等制度设计,实现了对各抗日力量的有机整合,这种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建立在对矛盾特殊性的科学分析之上。列宁曾指出:“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9]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政治实践,正是这一论断的生动体现——既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又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正成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面对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统一战线策略,其科学性在于既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又尊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特殊性。这一政策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得以深化,党中央来到西北后,妥善处理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关系,将“剿共”防线变为“西北联合抗日”的统一阵营。列宁曾指出:“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进行一切必要的实际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9]203}以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为例,参议会中非党人士占比达2/3,开明士绅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议案获毛泽东批示采纳。这种政治包容有效扩大了革命政权的社会基础,以晋察冀边区为例,“参加区选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80%以上,参加县选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86.3%,参加边区参议会选举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91.1%,中心区的阜平、平山参加选举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98%,有的区村达到100%”^[10]。其投票率远超同期国统区,充分彰显了这一制度设计的政治效能,既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核心地位,又通过包容式治理凝聚了抗日力量,为统一战线策略的实践提供了典范。

社会层面的整合创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处理阶级关系的政治智慧。“减租减息”政策作为一项创造性制度安排,平衡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利益关系,既改善了农民生活,以动员最广大民众参与抗战,又适当照顾地主利益,以维持抗日联合。这种政治整合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建立在对矛盾特殊性科学分析之上的积极建构。实践表明,太行山区地主自愿捐粮支前的案例在政策实施后增长了近5倍,而佃农的生产积极性也大幅提升。此外,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推行“代耕队”制度,组织贫农、雇农为抗日军属代耕土地,既解决了军属生计问题,又强化了军民团结。针对根据地一些地方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所衍生的党员干部的本位主义等问题,中央号召各根据地普遍开展拥政爱民与拥军优属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确定1943年1月25日至2月25日为边区拥军运动月,并以各种形式对军人及抗属进行慰劳。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打破“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11]的局面,中国共产党积极把握国际抗战大势,主动提出和践行与英美等国合作事宜,逐步实现从孤立状态到“有限合作”的外交突破。1938年—1941年,陕甘宁边区交际处根据周恩来提出的“宣传出去,争取过来”方针^[12],接待了中外客人7000多人。毛泽东会见英国记者贝特朗时指出:“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1]375}汇聚延安的外国观察家都折服于其时身处“弱势”却坚决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人。斯诺、斯特朗等国际友人的客观报道,成为突破国民党十年舆论封锁的关键力量,使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真实图景得以传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在战略上与美军太平洋战场形成有效配合,这种实战中的协同效应,为双方建立官方联系奠定了基础。1944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美军观察组赴延安,正式确立与中国共产党的准官方关系。中国共产党以向盟军提供日军详细情报、成功营救百余位美国飞行员、协助绘制华北航空地图、协助建立气象站等行动,满足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需求,也为自身争取到急需的药品与通信设备。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将民族

解放斗争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的战略视野的生动体现,也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事业”这一科学论断的自觉遵循。

三 发展智慧:化匮乏为动力的生存革命

通过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所形成的发展智慧,为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红军假若没有足够的粮食,就不能成为强有力的红军,因为没有粮食,军队就不能自由行动,不能维持军队人员的生存”^[13]。党中央及红军主力进驻陕北后就面临脆弱环境带来的物资短缺问题,1936年,全边区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03.4万余石,不足以养活众多人口,“不利于大军作战”^[14]。“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7]892}。面对根据地的极端物质匮乏,中国共产党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大生产运动”等实践,不仅有效保障了边区军民的基本生存与发展需求,而且推动了经济结构从单一的农业生产向农、工、商多元协同发展转变,社会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其实质是以生产关系的创造性调整解放生产力,以制度创新激发劳动者潜能,从而在极端条件下完成生存保障与发展积累。毛泽东曾指出,通过改革土地制度,“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起来”^{[7]1078},抗战时期的经济实践正是这一思想的先导性探索。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在物质条件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不仅解决了生存问题,而且积累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宝贵经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提供了实践样本。

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社会发展。特别是在抗战相持阶段,面对根据地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没有停留在简单的生产自救层面,而是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创新重构生产关系。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41年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不仅是一场经济实践,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通过建立“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等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互助劳动组织,逐渐将分散的小农经济改造为具有规模效益的集体

生产体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量的增加,已属惊人”^{[7]1078}。这种组织形式使劳动力效率提升40%以上,粮食产量在1943年达到184万石,比1940年增长近一倍。这种变革验证了马克思关于协作劳动“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的论断^[15],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

生产关系的创新性调整激发了劳动者的创造潜能。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精神激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劳动竞赛机制。1943年,边区开展“吴满有运动”,评选出500多位劳动英雄,毛泽东充分肯定劳动英雄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进步势力,是边区政权的重要依靠力量,并指出劳动英雄起了三个作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7]1014}。延安时期英模表彰运动的最大特点在于逐步制度化、规范化。通过授予“劳动英雄”称号、颁发毛泽东亲笔题词的奖状等方式,实现了精神激励向物质生产的转化。边区军民开展向劳动模范学习活动,形成了“比学赶帮超”的劳动热潮,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王绍棠由于工作方法之改造,使每人每日产量增加了四倍,刘克勤超过预产量三倍,解聆森一天产量等于别人三天,常胜基一天完成两天半的生产”^[16]。这种激励机制的成功实践,印证了恩格斯关于“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的论断。与1939年前相比,1945年边区耕地面积增长了79.4%,植棉面积增长了270.6%,牛、羊、驴数量增长了200%~300%,探索出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发展经济的路径。

金融与工业领域的制度创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的战略眼光。面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政府突破常规,建立了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银行率先发行边币并肃清伪钞,不仅解决了财政危机、积累了丰富的金融治理经验,更通过“物资本位”的货币制度(以盐、棉等战略物资为发行准备)维持了币值稳定。在工业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出“三位一体”的国营经济体系:军工企业保障战争需要、民用工厂满足基本生活、合作社经济吸纳民间资本。至1942年,边区的国营工厂发展到62个,职工近4000人,年产土布10万匹,并能自己炼铁、炼油,修造小型机器,配置军需品。到1943年,边区军民已克服经济

困难,渡过难关,达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这些经济实践,既遵循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原理,又创造性地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为后来的经济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根据地军民在极其困难的物质条件下,确立“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立足实际、统筹兼顾,取得了公私经济发展壮大、人民负担减轻、丰衣足食的重大成就,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四 求是智慧:化分歧为共识的思想整风

通过整风运动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形成的求是智慧,为全党达成思想统一和行动一致提供了根本遵循。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鲜明品格和显著标志,“经常自己批判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与任何其他革命的区别,而延安整风运动正是对这一基本特质的自觉践行。通过调查研究,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路径,达成全党思想认识的辩证统一,这一过程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论实践。旨在通过思想斗争达成共识,将分散的、感性的经验整合为系统的、科学的行动指南,推动“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螺旋式上升,从而为革命实践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统一的行动纲领。马克思主义主张理论与实践的具体历史统一,坚决反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整风运动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既纠正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更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7]812}中国共产党通过这场“思想上的革命”^[17],不仅化解了当时的路线分歧,达到了挽救同志、团结党员的目的,而且培育出一支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干部队伍,为革命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保障。

作为一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的核心价值在于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尖锐批判“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等不良作风^{[7]797},直击党内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积弊。整风运动创造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道路,通过

检视问题、纠正失误、加强建设,推动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学风、党风和文风的整顿。毛泽东所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具体方法,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又摒弃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规律的深刻洞察,实现全党自我革命的理论自觉和能力提升。

调查研究方法的制度化是整风运动的重要创新。张闻天率领的“延安农村调查团”历时一年零两个月,走访陕北23个村庄,形成了《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等一批经典调研报告。这些报告不仅为制定土地政策提供了依据,而且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将这种方法概括为“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认识论循环。在调查研究中,党员干部必须“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这种态度的转变实质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生动实践。周恩来始终强调,“力量的源泉是人民”“要相信群众力量”。周恩来指出,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群众接近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倾听群众意见”“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等,“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18]。通过深入群众、求真务实的调查研究,在复杂的斗争中及时了解群众意愿、掌握群众动态,打破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本本主义倾向,为党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可靠的事实依据。

理论创新与文风改造相结合,彰显了延安整风运动的辩证智慧。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所列“八大罪状”,不仅是对不良文风的批判,而且是对形式主义思维方式的清算。与之呼应,赵树理创作的《小二黑结婚》等文艺作品,以群众语言阐释革命道理,推动了政治话语的平民化转型。理论层面,《新民主主义论》系统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与前途,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里程碑。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9]。这种理论创新绝非书斋中的抽象思辨,而是植根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证分析,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质。至1945年党的七大,全党在毛

泽东思想指引下实现空前团结统一,凝聚起夺取抗战胜利的磅礴力量。

五 决策智慧:化被动为主动的战略布局

通过科学把握战争规律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所形成的决策智慧,为在变局中把握历史主动提供了战略指引。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是制定正确战略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特别需要严格地把共产主义观察、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新民主主义的实际政策相区别”^[20]。《论持久战》等战略著作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们通过对客观规律的战略洞察,把握历史进程中的矛盾转化节点;同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战略原则性与战术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列宁曾指出,“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必须懂得,除了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9]139},且“必要的退却进行得愈自觉,愈协调,成见愈少,那么,我们会愈快停止退却,而随后的胜利进击就会愈有把握,愈迅速,愈波澜壮阔”^{[9]617-618}。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战略决策,完美诠释了这一思想——既不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倒,也不盲目冒进,而是科学预判战争进程,灵活调整斗争策略。这种决策智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必然与自由、客观与主观的辩证关系,既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通过创造性实践,推动规律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化,使党在力量对比不利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把握历史主动,为最终赢得抗战胜利奠定战略基础。

科学的战略布局彰显了中国对战争规律的深刻洞察与灵活运用。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1]447},分析了双方“强中有弱、弱中有强”的矛盾特质;同时,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必将经历战略防御、相持与反攻三个发展阶段的历史进程。1938年武汉失陷,正面战场国民党军溃退之际,八路军、新四军果断向日军后方挺进,于华北、华中等地开辟出19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将这种敌后抗战格局形象地比喻为围棋中的“做眼”,强调“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1]427}。这一战略空间的重塑迫使日军在占领区陷入困境,其占领的“点线”被广阔的敌后根据地所包围和割裂。至1941年,敌后战场已牵

制了58%以上的侵华日军和90%的伪军,成为支撑全国抗战的坚强支柱。刘伯承在总结太行山反“扫荡”经验时提出的“梅花桩”式据点部署,注重小部队的正规战术素养,以分散对集中,以机动破呆板,使日军陷入“处处挨打、疲于奔命”的困境。

战略时机的把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遵循列宁关于革命领导者必须根据形势变化“领导无产阶级选择最果断最适当的斗争手段”的策略要求^[2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行动原则,既审慎避免在不利条件下过早消耗力量,又敏锐捕捉稍纵即逝的战略契机,并果断建构战略支点,在历史关键节点上化危为机、谋定后动。1939年初,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1944年9月,部署多地成立满洲工作委员会,1945年8月,派遣冀热辽军区部队1.3万余人和2500多名地方干部挺进东北,这些举措为抗战胜利后中共力量迅速进入东北,进而以东北为战略后方,推进全国解放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来根本性转折。中共中央果断决策,于1944年在各敌后战场全面发起局部反攻,收复重要地区,建立更广泛的人民政权,壮大军队实力并增强群众基础,为抗战胜利后争取和平民主建国、应对可能发生的复杂局面,进行了至关重要的政治准备和实力布局。

统一战线策略的灵活调适,充分彰显了中国对高超的政治智慧与战略远见。毛泽东曾明确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22]。抗日战争期间,依据战争形势的演变,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策略先后经历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递进式转变,并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秉持大局观,公布国共摩擦的真相,宣传中共维护团结抗战的政治主张,同时又积极维护统一战线的整体性,避免了抗日力量的内耗。毛泽东以陕北毛驴上山“一拉、二推、三打”为喻,阐明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既团结联合,又适时斗争”的方针,体现了原则

性与策略性的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总兵力从抗战初期的5万余人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8万人,控制区域达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党中央在各个历史关头的正确决策密不可分。

六 结语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2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转危为机的历史实践,正是对这一科学论断的生动诠释,其中蕴含着超越特定时空的普遍方法论价值。具体体现在:创新智慧以方法论突破回应现实困境,为破局提供可能;团结智慧将方法转化为政治合力,构筑起抗战的力量基础;发展智慧进而夯实物质根基,支撑持久斗争的实际需要;求是智慧通过思想整风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全党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最终升华为决策智慧,在历史转折中把握战略主动。这一过程是从“认识论飞跃”到“实践论展开”,再到“价值论实现”的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本质上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认识论、融合历史洞察与行动方略的系统性方法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层面的创造性展开。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过程中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也是将普遍原理与特殊国情相结合过程中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更是对历史经验的批判继承与发展创新相统一的结晶。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应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创新维度上,需聚力将外部技术压制转化为自主创新的强劲驱动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技术壁垒;在团结维度上,要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有效应对单边主义与霸权行径;在发展维度上,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数字化、绿色化协调发展;在求是维度上,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握时代脉搏,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策略维度上,加强战略谋划与底线思维提升应变能力,于世界变局中稳健布局新发展格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24]抗战时期党所淬炼的这种化危为机的实践智慧,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实现逆境崛起的制胜密码,而且是中华民族在新时代应对风险挑战、推进民族复兴伟业战略遵循。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79.
- [2]刘帅.八路军成功开展敌后游击战[J].共产党员(河北),2025(10):52-54.
- [3]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五辑[M].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6:340.
- [4]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六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179.
- [5]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资料:第六辑[M].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8:363.
-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41.
-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48.
- [8]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7.
-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89.
- [10]谢忠厚,居之芬,李铁虎.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简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52.
- [1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3.
- [12]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200.
- [13]陈潭秋.陈潭秋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87.
- [14]王焰.彭德怀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52.
- [1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21-422.
- [16]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2.
-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9.
- [18]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1.
- [19]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33.
-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528.
- [2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74.
- [2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5.
- [2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5.
- [24]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76.

【责任编辑 芮芳】